

做學問的境界

劉曙光

[提要] 近些年來,學術不端、學術失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學術生態的治理與改善,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有關管理部門出台相應的法律法規來進行“他律”,更需要廣大科研工作者具有良好的學風、學術道德來進行“自律”。科研工作者的自律,其中,需要解決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是,學術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做學問到底是為稻粱謀,還是為了審美“趣味”?是為了功名利祿,還是為了立德立言?人生的境界決定治學的境界、決定治學的成就。不斷提高人生的境界,包括做學問的境界、寫作的境界,這恐怕是解決學術不端、學術失範問題更為根本的策略。

[關鍵詞] 人生境界 做學問的境界 為己之學 為人之學

[中圖分類號] C0;G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4-0119-13

學術不端、學術失範已成為學術界的頑症痼疾,久治不癒,甚至愈演愈烈。人們不禁要問:學者到底為了什麼做學問?是為了功名利祿,是為了年度考核,是為了領導的批示^①,還是為了審美“趣味”,為了立德立言?這些以前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卻越來越成為問題,而且,越來越成為嚴重的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近些年來,學術失範、學術不端現象屢見不鮮。近一段時間,被揭露出來的學術不端現象確實觸目驚心。在課題申報中,拉關係,走後門,使盡渾身解數;而在完成課題時,卻是敷衍塞責,馬虎應付。在科研中,弄虛作假,抄襲剽竊,沽名釣譽,急功近利。有的作者只是為了寫文章而寫文章,只是為了課題結項、職稱評定、職務晉升、科研績效考核、各種各樣的評獎、學位答辯甚至稿酬發放而去拼湊論文。除了“學而優則仕”,還有“仕而優則學”、“富而優則學”,有的人發表文章,目的就是要做“學者型官員”、“學者型企業家”,名利雙收。殊不知,論文既可以成為往上爬的梯子,也可能成為一個讓人痛打的靶子。

極少數頭頂各種光環的學者,因為學術不端、學術失範,一時身敗名裂,斯文掃地。特別是梁瑩事件後,一些學者感到“自危”,也要求從一些數據庫中撤下自己的文章。一些學者對自己的學術成果,沒有底氣,因而不願意參加各種各樣的評獎,不願意出頭,不願意把自己推上風口浪尖。有的

學者冠冕堂皇地說，自己不在乎論文的稿酬。事實果真如此嗎？可能恰恰相反。作者從以前的不考慮稿酬的多寡，到越來越在乎文章帶來的收益，投稿之前總是權衡再三，算計了再算計。有的學者為了個人利益放棄學術操守，違背學術道德。有評論家公開立約，明碼標價，向藝術家收取高額勞務費，還立下千字多少錢、未滿千字須作千字算，及有關評論發表與被引用等諸多規矩。更有些學者，把“忠誠”的美德拋到了腦後，以“人才引進”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變賣”自己，頻繁地變換工作單位，不斷地抬高自己的身價，“哪裡有利（諸如提職稱、調級別、漲工資、或者有更多的科研經費、更寬敞的辦公條件、更舒適的住房環境等等），就往哪裡去；而對於為他的成長付出了無數辛勞的單位沒有多少感恩之意，沒有多少眷戀之情。常以一己之利為衡事量物的標準，一件事情不順心、一個條件不能滿足，就另覓高枝，掉頭不顧”^②。這樣的學者或許是才華橫溢，可是他的德行和操守呢？一個學者應該是德才兼備的表率，而不能把自己變成一個追名逐利之徒。

為了獲得優質稿件，各學術期刊爭相提高稿酬。個別期刊稿酬標準更是高得令人瞠目結舌。稿酬上的惡性競爭，恐怕並不是辦出高水平刊物的一劑良方。各學校、各院系為了激發教師科研的積極性，提高學校的排名和學科的排名，也在不斷進行“物質刺激”，不斷提高科研獎勵。如此以心為形役，種種現象背後折射出來的，是社會大氣候對高校風氣的影響，是學風的浮躁，甚至是學術道德的淪喪，是社會上拜金主義、個人享樂主義之風在高校中的蔓延。這裡，已全然沒有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安貧樂道”的秉性：“全真保性，不以物累形”。

與此同時，人們也在不斷地反思，當代學術界為什麼難出大師、難出大家？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一個最根本的制約因素，恐怕是學者的心胸、格局、眼界、人生境界。做學問是需要有一種崇高的境界的。有了這種境界，才能正確地對待苦和樂，才能正確地對待得與失。毋庸諱言，相當多的學者還只是停留在為稻粱謀的人生境界或學術境界。可想而知，汲汲於名利、戚戚於富貴，這樣的學者不會把做學問當成生活的第一需要的，也是難以真正潛心於學問而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

自古以來，真正的做學問的境界，應該是超越功利、高遠曠達的。學術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福祉，這和《大學》闡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脈絡一貫，密切相通。讀書、做學問，不只為修業，不只是會找研究題目，不只是會引經據典而已。《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先賢曾文正公曾言：此三者“皆我分內事也”，誠哉斯言。^③

千百年來，人們都在參究孔顏之樂、所樂何事的問題。在談到顏淵時，子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孔子自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那麼，孔顏之樂，顯而易見，他們所樂的並不是單純的物質生活，而是一種崇高的精神生活。“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這種崇高的精神生活恐怕不外乎聞道、問道、悟道、得道、行道、佈道、樂道。戴震說，學者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因為君子“務在聞道”。^④樓宇烈先生認為，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證道為根本。曾經有人問王力先生，為什麼能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一貫地進行學術研究，他很樸實地回答說：“我的求知欲很強。我覺得從不知到知，從不懂到懂，這是一種快樂。幾十年來，我已經習慣搞研究工作，讓我放下就感到無聊，日子就不好過。”^⑤這就是一種求道、悟道、樂道的境界。

這種境界有時也以學術“趣味”的形式體現出來。前輩學者常以學問的趣味來啟迪後生，使他們在愉快的心情之下走進學問的大門。梁啟超就說過：“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裡頭所含的一種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恐怕所剩下的僅有個零了。”

梁啟超先生注重趣味，只是“無所為而為”，故能有他那樣的成就。梁實秋先生感歎地說，一個人在學問上果能感覺到趣味，有時真會像著了魔一般，真能廢寢忘食，刻苦鑽研，鏗而不捨，在學問上焉能不有收穫？^⑥梁啟超認為，做學問就是一種審美的境界。審美趣味是人們“生活的原動力”、人生觀的“根柢”，如果“趣味喪掉，生活便成了無意義”，“高等趣味即審美趣味”。^⑦

作為一個學者，其“文化身份”的特質應該是：獻身學術，自覺追求學問，而不是追求管理界批發的種種標籤；堅持獨立思考，不盲從迷信，而不是人云亦云；有擔當精神，有自覺的社會責任感，而不是隨波逐流；追求理想，追求夢想，而不是急功近利。但是，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當今學術屬於一種制度性的活動”，學術界並不是什麼世外桃源，學者處在“體制”之中，“承受著各種各樣的現實壓力，純粹為求知而讀書治學，近乎迂腐悖時的怪異之舉”。頻繁的考核，不斷的申報，各種量化的指標，使人疲於奔命，給學術帶來巨大的扭曲和損害。^⑧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本節的內容，來總結“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的區別，我想《論語》中的這句話是十分恰當的：“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

二、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

做學問到底應該是功利性的還是趣味性的，到底應該是功利境界還是審美境界？問題的提出，是源於《論語》中的一句話：“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毫無疑問，這裡的“為己”不能解釋成為一己之私，“為人”也不是為他人謀福利。如何解釋“為己”“為人”，是理解這句話的關鍵。關於這句話，學術界有不同的理解。

一般通行的解釋是：古代的學者注重內在的克己、修己、治己，注重培養自己多方面的良好品行，尤其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即進德修業；相反，今天的學者更看重的是個人的功利（面子），注重自己外在的、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名聲。

朱熹的《論語集注》有一段注解。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之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為學，如果是“欲見之於人”，沽名釣譽，必定“終至於喪己”；相反，為學如果是“欲得之於己”，則“終至於成物”。可見，“為人”“為己”兩種不同的治學態度，所得到的結果也是截然不同的。^⑨

荀子把為學的境界分為君子之學和小人之學。君子之學是為了美身進德，而小人之學則是炫耀於世、取媚於人。“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荀子·勸學》）

“為己之學”也可以說是“君子之學”。君子之學，落實到行動中，即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是為了使自己成為更加完美的人。小人之學，則只是把為學當作禽犢一樣的干祿進身、取悅於人的禮物。正是採用了《荀子·勸學篇》對為己和為人的解釋，楊伯峻對“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譯文是：古代學者的目的在修養自己的學問道德，現代學者的目的卻在裝飾自己，給別人看。^⑩君子的養成主要靠自己，即反求諸己，不隨波逐流，“篤志而體”，既能志向堅定，又能身體力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為己之學，旨在追求真理和提升自我，乃是真學問，為求自得，造就的是真君子、真道德、貴己之人；為人之學，乃偽學問，追名逐利，造就的是偽君子、兩面人、喪己之人。由此可見，做學問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概括為“進德修業”。

與此相關，陳寅恪認為讀書、做學問是自己的事情，是目的不是手段，要把學問當作根本，當作

生命。陳寅恪給北京大學1929年畢業班學生的題詩是：“添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①他自己一生讀書不為取悅別人，不為名利。清華大學校長邱勇教授在2019級研究生開學典禮的講話中引用了這首詩，希望學生對真理抱有至高的敬意，將熱愛和探索真理作為人生目標，而不要把論文、職稱、學歷、獎項作為學術研究的目標，“要用一生去追求真學問，做淡泊清明的真學者”。

對為己與為人之學，錢穆先生的看法比較特別。他把“為己”解釋為“德行之科”，把“為人”解釋為“言語、政事、文學之科”。“孔子非不主張學以為人，惟必有為己之本，乃可以達為人之效”，“己立己達是為己，立人達人是為人”。^②

在錢穆先生解讀的基礎上，有的學者對“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作了新的、比較契合現時代的解釋。如涂可國認為，站在整個儒學系統來看，儒學不是單純的為己之學，而是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統一。為己的內容主要是：仁者自愛、克己由己、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自尊自強、正己正人、修身為本、反身而誠。為人的內容，除了直接明言的孝悌的為人、進取的為人、交往的為人和求善行道的為人，還構建了間接明言的為人之學，包括愛人利人、成人之美、與人為善、修己安人、立人達人、不必為己。^③不管對“為己”、“為人”作怎樣的解讀，做學問的目的首先是篤志而體、立己達己、以美其身，是養成君子人格，而不只是功利性的。

三、人生的境界

我們所熟知的一些說法，如，“詩無隱志，樂無隱情，文無隱意”（《詩論》第三章），“人必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袁枚語），“文如其人”，這些說法都表明：情感、思想、文字的表達，其實是一個人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表達；做學問的境界，反映的是一個人的人生境界，即“為學與為人，其道一也”。學者也是普通人，他們同樣具有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權利。但是，作為學者，作為知識精英，他們又不是普通人，他們可能更多地在追求一種“逍遙”、“適性”的生活。尤其是在做學問的時候，他們更應當達到一種審美趣味，達到天地境界、審美境界。如何達到這種做學問的境界，王力先生說：“首先要從人生觀上解決問題。一個人為什麼要活著？是不是只是為了穿衣吃飯？或者說只是為了物質享受？我以為，穿衣吃飯是為了生活，而生活卻不是為了穿衣吃飯。生活應該有更高的目的。”^④這種更高的生活目的就是一種更高的人生境界。

（一）馮友蘭的人生境界說^⑤

馮友蘭指出，人的各種行動帶來了人生的各種意義，這些意義的總和構成“人生境界”。不同的人們可能做同樣的事情，但是他們對這些事情的認識和自我意識不同，因此，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意義也不同。每個人有他的生命活動的範圍，與其他任何人都不完全一樣。儘管人與人之間有種種差別，我們仍可以把各種生命活動範圍歸結為四等。按照從低到高的順序排列，這四等是：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講求實際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義，不謀其利”的“道德境界”；超越世俗、自同於大全的“天地境界”。

馮友蘭先生認為，哲學的任務是為了提高人的心智。第一種人按照他的本能或社會習俗而生活，好像兒童或原始社會中的人，他們做各種事情，而對自己所做的事情缺乏自覺，或並不真正意識到它的意義。因此，他所做的對自己並沒有什麼意義。這種人生境界就是“自然境界”。第二種人，他有私心，並且時刻意識到自己，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自己。這不一定表明他就是全然不講道德。他也可以做一些有益於別人的事情，但他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了自己的好處。這種人生境界

就是“功利境界”。第三種人,懂得世界上除了自己,還存在著一個作為整體的社會,自己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本著這樣的理解,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好處;他行事為人為義,而不是為利(“正其義而不謀其利”)。他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所做的都合乎道德。這種人生境界可以稱之為“道德境界”。最後,人也可以達到一種認識:知道在社會整體之上,還有一個大全的整體即宇宙。就社會組織來說,他是一個公民;但他同時還是一個“宇宙公民”。他在做每一件事時,都意識到,這是為宇宙的好處。這種更高的人生境界,這就是在精神上超越人間世的“天地境界”。

馮友蘭先生認為,前兩個境界可以說是來自天然,後兩種境界則是人自己的心靈所創造的。人在道德境界中生活的衡量標準是“賢”,它的含義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中生活,則是追求“成聖”。成聖是人所能達到的生命最高點。

大事業大學問往往都是在無功利心的境界中完成的。正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在馮友蘭誕辰 120 週年之際,陳來提出把《新原人》的境界說提升為倫理學的一種形態,即境界倫理學,境界倫理學具有可發展為目前西方德行倫理學和規範倫理學的前景。他在研究馮友蘭境界說的基礎上,揭示了馮友蘭境界說體系的內在問題,並由此提出改善的方案和方向,以求推動境界倫理學的進一步發展。陳來提出,第一,取消自然境界,以功利境界為最低層次境界,其中又分三種,利己害人,利己心強而不害人,有利己心而不強。對一般的合理利己境界加以寬容。第二,以無功利境界為第二層次境界,可分為儒家的道德境界、道家的自然境界和佛教的無相境界,以對峙功利境界,改造人生的精神境界。第三,以終極關懷為第三層次境界,又可分為社會理想境界、萬物一體境界、東西方古今宗教境界。^⑥

(二)張世英的人生境界說

張世英先生指出,任何一個人,都是宇宙間無窮的相互關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網絡中的一個聚集點或交叉點。這個點不是實體,而是空靈的。人之不同於物的地方在於人這個聚焦點是“靈明”的。“靈明”的特點就是能超越在場,把在場者與背後千絲萬縷的不在場的聯繫結合為一。正是這點“靈明”構成了一個人的“境界”,動物不能超越,故無境界之可言。“境界”就是一個人的“靈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於其中的、有意義的世界。

境界這個交叉點也就是人所活動於其中的“時間性場地”,它是一個由過去、現在和未來構成的現實的現在,也可以說,是一個融過去、現在與未來為一的整體。一個人的過去,包括他過去的經歷、思想、感情、慾望、愛好以至他的環境、出身等,都積澱在他的這種“現在”之中,構成他現在的境界。而未來在現在中“先在”,他對未來的種種嚮往、籌劃、志向、志趣等,也都構成為他現在境界的內容。張世英先生關於境界的定義,讓人聯想到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論述。“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張世英先生把人的精神境界,按其實現人生意義、價值的高低標準和人生在世結構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四個等級:慾求的境界(滿足個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慾望)、求實的境界(不再只是滿足於最低的生存慾望,而是更進而要求理解外在的客觀事物的秩序)、道德的境界(以對萬物一體的領悟作為自己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作為自己所應該做之事而為之奮鬥不已)、審美的境界(屬於高級的主客融合的在世結構,完全處於一種人與世界融合為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之中)。審美境界是一種完全的自由,是一種既超越科學又超越道德的人生境界。一般來說,人往往是四種境界同時具有。但是,各種境界的比例關係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表現:有的人這種境界佔主導地位,有的人另一種境界佔主導地位。^⑦

馬克思指出：“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麼感覺；經營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因此，一方面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一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¹⁸地質學家求真（主要是求實的境界），商人求財（主要是慾求的境界），文人雅士求美（主要是審美的境界），他們所追求和實現的生命的價值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生境界對待“道”的態度截然不同，“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不同的人生境界對待“名”的態度也截然不同，“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生命正是通過得道而閱歷豐富、品位提高、眼界開闊、思想深刻、品格完善、境界提升，進而融入宇宙天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體悟到萬物一體、天人合一，體悟到生命的意義，達到詩意的人生境界，“人，詩意的棲居”，這種快樂是不可言喻的。就為學而言，人生境界的高低決定了學術水平、學術境界的高低。一流的人生境界方可產生一流的學識水平、一流的學術成果。作為一個學者，要不斷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和學術境界。“胸懷學術與胸懷稻粱，胸懷宇宙與胸懷孔方，其境其果決不會相同。斤斤計較利益得失，煩惱多多，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事業之中，文章必然做不好。古人推崇的人格心性如超然物外、豪放灑脫、不拘小節，非心胸豁達之人不能為。”¹⁹

孫正聿先生認為，為入之道和為學之道，只有都達到一種“灑脫通達的境界”，才是“其道一也”。為人與為學的境界，並不是玄虛的、神秘的，而是具體地體現在為入和為學的“大氣”、“正氣”、“勇氣”。所謂“大氣”，就是要志存高遠，有高尚的品格和品位、有高遠的志向和追求、有敏銳的問題意識、有高明的思想和見地。所謂“正氣”，就是要有老老實實做學問的態度，真誠地求索、有抑制不住的渴望、敢於直面事物本身。所謂勇氣，就是要有想像力、創造力、批判力，“異常的思考”、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信念、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理想。這種“大氣”、“正氣”、“勇氣”，就是為人、為學的境界。²⁰

四、學者的使命：做預流的學問

學者的使命是動態的、變化的，也就是說，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時代、每一地域的學者對學者使命的認識都不一樣。確切地說，學者的使命，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一）學者的使命

對學者的使命的認識，古今中外的認識與探索，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殊性，既有全球性又有民族性，既有時代性又有永恆性。

1. 中國學者

儒家學者自古以來胸懷大志，以平治天下為己任，有家國天下的使命感，以崇尚正義、精忠報國、救濟黎民為最高理想和人生價值追求。如，孔子強調“仁”和“禮”，以維持社會的和平穩定。孟子更是以“平治天下”自負，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唐韓愈和柳宗元提出“文以載道”，試圖消除綺麗虛浮的文風。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自述學術宗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王陽明指出：“學問的根本在日用間。”²¹

王國維強調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超功利性，他批評培根的學術“實則彼之說，太偏於實用，彼蓋純以厚生、利用為諸學問之目的者也”。在《國學叢刊序》中，他說：“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²²

馮友蘭晚年曾經親筆書寫一副對聯用以自勉：“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他說“上聯說的是我的學術活動方面，下聯說的是我所希望達到的精神境界”。馮友蘭指出：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所謂“舊邦”指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傳統，“新命”指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他認為，“闡舊邦以輔新命”就是要“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養料”。“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右翼人士贊成，左翼人士譴責），而又同時促進新命（左翼人士讚揚而右翼人士譴責）。我有時強調這一面，有時強調另一面。”²³“闡舊邦以輔新命”就是學者的使命。“舊邦”是“新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它也告訴我們該怎樣做學問。

儒家學者歷來是社會的精英階層，往往能進入政權的核心，參與朝政，制定規章制度，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時移世易，學者也在變換自己的角色，調整自己的社會定位。科舉制實行時，知識分子信仰“學而優則仕”，“修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隨著科舉制的廢除，知識分子多少有一些失落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就一番功名的理想，與現實或許會有一定的差距，人文學者一般不再直接參與國家決策，社會影響力有所下降，引導時代潮流的力量減弱。但這並不妨礙學者的使命感，他們仍然堅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這一信念成為中國學者的遺傳基因。無論如何，未來世界需要的是具有人文情懷、探索精神、心胸博大、視野開闊、具有充沛情感、具有審美能力的人。

2. 歐洲學者

18世紀中葉的德國學者費希特認為，學者的真正使命在於“高度關注人類一般的實際發展進程，並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²⁴人類的整個發展直接取決於科學的發展，而每一個學者都本能地要求進一步發展科學，特別是發展他們所選定的那部分科學。學者應當盡力而為，發展他的學科；他不應當休息，在他未能使自己的學科有所進展以前，他不應該認為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職責。學者要忘記他剛剛做了什麼，要經常想到他還應當做些什麼。學者對於社會發展進程的促進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覺悟，一是行動。既要有宏大的歷史使命感，又要有躬行踐履的實踐精神。學者的使命不僅是解決理論問題，更應注重實踐。這與中國儒家學者的崇高精神和終極使命高度契合。

費希特認為，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學者特別擔負著這樣一個職責：優先地、充分地發展他本身的社會才能、敏感性和傳授技能。“傳授技能總是學者所必需具備的，因為他掌握的知識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社會”，“學者現在應當把自己為社會而獲得的知識，真正用於造福社會”，“就學者的使命來說，學者就是人類的教師”。學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應當比其他階層走在前面。學者“應當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他應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我的使命就是論證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運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響卻無限偉大。我是真理的獻身者；我為它服務；我必須為它承受一切，敢說敢做，忍受痛苦。”費希特時代學者們對社會、對人類文明所懷抱的那種神聖的使命感，讓一切有宏偉抱負的學者特別是青年學子的心靈受到震撼。

費希特對學者的要求便是行動，“我寄希望於行動，行動也屬於使人類完善的計劃之列。站在那裡抱怨人類墮落，而不動手去減少它，那是女人的態度。不告訴人們應該怎樣變得更好，就進行懲罰和挖苦，那是不友好的態度。行動！行動——這就是我們的生存目的”。²⁵這一思想與馬克思的名句“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²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比費希特晚一個世紀的德國現代學者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的演講，非常注重學術的價值和學者的價值。在韋伯那裡，學術對於學者來說，既是一種職業，又是一種事業。職業是謀生的手段，是物質意義上的；而事業則是人生的追求，是精神意義上的。學者的生涯首先是職業，而學術事業則要受制於職業的環境和人事的狀況等。他認為機遇很重要。教師重要的是教授規範，不是“育人”。韋伯時代對學者的使命感或許不如費希特時代那麼崇高，但更實際一些，首先關注自我的生存環境，而不是在困厄和貧窮中產生推動社會發展的思想。

作為知識精英，學者當然應該為人類福利而勞動。學者作為一種身份，首先是一種精神追求，而不是一種功利活動。正如馬克思 17 歲時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所說：“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我們就不會被任何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大，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3. 學者：社會的良心

雖然我們提倡學者要摒棄功利思想、要有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但是，在批評某些學者把學術研究變成謀利、謀生手段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知識分子、學者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可能超凡脫俗。知識分子、學者也是人，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他們也有義務為自己的家庭、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我們也不希望學者成為“腐儒”。

古代儒家雖然認為精神生活更為重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但也承認物質生活的重要性。孔子論為邦之道，認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董仲舒對“義”與“利”的關係作了較為深刻的揭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²⁷從社會對待學術和學者的態度，可以反映出這個時代的文明程度。當今社會已不再要求學者“安貧樂道”，政府、社會、學校給予了學者較高的尊重和敬意，也給學者提供了較為優厚的待遇，基本上能保證學者“有尊嚴的生活”。

所謂學者的使命，其實，就是學者有一種“歷史”的意識和情懷。學者有學術承擔者的自我認知（即認為“我來到這世上是有使命的”、“我要承傳道統、學統”）。孔子有很強的使命感。孔子及早期儒家通過整理《六經》，為《六經》作《傳》、《記》、《序》，而建構了伏羲、神農、堯、舜、禹、文、武、周公的道統脈絡，奠定了早期儒家的道統思想。同樣，朱熹也有很強的“歷史”意識。朱熹及宋儒也是通過結集《四書》，分別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論語集注》作序，重新建構從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到程朱的道統脈絡，完成了宋儒的道統論思想體系。從承續道統脈絡，朱熹指出：“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²⁸，因此，“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才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裡。……若盡得這道理，方成個人，方可柱天踏地，方不負此生。”²⁹

林毅夫先生指出，一位想成為大師的學者除了要有孟子所說的“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自信心，而且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具有這樣大的使命感的學者，才會有縱的歷史觀和橫的全域觀，才有可能培養出王陽明所形容的“大如天”的洞悉事物本質的能力。同時，要成為一位大師也要有孟子所說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³⁰

人類的一切學問，包括哲學社會科學，都應當考慮“正德、利用、厚生”三個方面，即對提升人的

德性、對社會的改良、對民生改善有沒有意義。^④中國學術承擔著用理論照亮現實的使命。中國學者的使命不只是“學術”本身(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且關乎民族的命運和國家的興替(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回饋世界)。清華大學校長邱勇在2019級研究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題目就是“學術元求志,文章豈為名”,他指出“求索真理、獲得真知是學者的初心和使命。初心是起點和本心,使命是擔當和責任”,初心和使命,體現了一種身份,更體現了一種精神,“立志為學就要超越名利、超越已知、超越自我,不斷提升為人為學的境界”。

(二) 做預流的學問

做學問,需要對時代的材料、時代的問題有所“覺解”,要預研、研判、預測。“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⑤享譽世界的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也指出:“每個時代都要編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⑥

做學問,要“預流”,要“入流”,但不要隨波逐流。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看望了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習近平講了4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1. 做好文化文藝工作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意義重大。幾年來,文化文藝界、哲學社會科學界在正本清源上展現新擔當,在守正創新上實現新作為。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文化文藝工作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為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2. 要記錄新時代、投身新時代,與時代同步伐、與時代同行。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文化文藝和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文化文藝工作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要與時代同頻共振,承擔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勇於回答時代課題,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3.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多到實地調查研究,瞭解百姓生活狀況、把握群眾思想脈搏,著眼群眾需要解疑釋惑、闡明道理,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裡。“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於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希望大家立足中國現實,根植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

4. 要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自己首先立身要正,以高遠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為社會作出表率。

新時代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積極回應時代要求,以提升原創能力為出發點,不做西方理論的“搬運工”。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守正出新,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性的理論觀點。

五、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三種境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揭示了治學的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

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④

王國維所說的這三種境界，既是自己生活經歷之深切體會，又帶有普遍意義。不僅適用於大事業、大學問，也適用於對愛情的追求。王國維運用詞中形象表現主觀聯想，將晏殊、柳永、辛棄疾原是說愛情的詞，各截取其中幾句，重新組合，用以說明古今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三個境界。

(1)第一境界是求索階段。做學問一開始憑高望遠，難免會惆悵迷茫，但可以學習、總結前人治學經驗，通過博覽群書，開闊自己的心胸和視野，修煉性情和品位，要有執著的追求，登高望遠，瞰察路徑，明確目標與方向，瞭解學界的歷史、現狀、前沿。

第一境界強調的是“立”。做學問首先要有遠大目標。要有鴻鵠之志，不做蓬間燕雀。學術研究是薪火相傳，“智上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作後薪。”前面的燃料著盡了，後面的燃料要趕緊續上去。見賢思齊，我們可以向典範學習。向典範學習，重在揣摩和仿效。學習書畫要反復臨摹，學術研究也要仔細研讀經典名作。領略其學術境界，體悟其治學精神，學習其研究方法，如馮友蘭的《三松堂自序》。以前輩的治學經驗、學術境界、心路歷程，來激勵自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站位要高，眼界要廣闊，這是第一位的。

(2)第二種境界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兩句來自柳永的《蝶戀花·佇倚危樓風細細》。《全宋詞》既把此詞收為柳詞，又收為歐詞（歐陽修《近體樂府》卷二），故王國維定為歐公所作。一般認為是柳永所作。做學問，鑽研問題，不是輕而易舉、隨便可成功的，必須認定目標，堅定不移，磨練自己的意志和毅力，經過辛勤勞動，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孜孜以求，直至人瘦頻寬也不後悔。第二境界強調的是“守”，堅守。

其實，做學問不止是“衣帶漸寬”、“人憔悴”的問題，而是“燃燒生命”、“嘔出心肝”、“蠟炬成灰”。馮友蘭指出，歷來的哲學家、詩人、文學家、藝術家和學問家都是用他們的生命作為燃料，來傳遞人類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智慧之火。歷來的著作家，凡是有傳世著作的，都是嘔出心肝，用他們的生命來寫作。無論是寫一篇文章、作一首曲、寫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來，傳世之作就不用說了。李商隱有兩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蠶是用生命來吐絲的，蠟是用生命來發光的。^⑤

(3)第三種境界，做學問，必須有專注精神，反復追尋、研究，下足功夫，才會頓悟、豁然貫通，於別人未見之處有獨到的發現、有真知灼見。“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第三境界強調的是“得”。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沿著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六、寫作的境界

由於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對學術論文只重數量不重質量。有的學者在寫作的過程，對論文灌注大量水分，將本可以寫成一篇文章硬生生拉扯成兩篇或多篇，或者，將已經發表過的論文改頭換面重複發表。這裡，就有一個學術論文寫作的境界問題。

精深的學問和傳世的佳作是什麼樣的？北宋人吳縝說：“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⑥王若虛在《文辨》中有一段精彩的對話：“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

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則須有。’”^⑧意即寫文章沒有固定的模式、格式、套路，但是，一定有基本的章法、體例、原則。周國平《平淡的境界》^⑨是談散文的寫作的，如果我們稍稍修改一下，也是非常適合於學術論文的寫作。

平淡不僅是詩歌、散文寫作的極境，也是學術論文寫作的極境。周國平先生說，平淡不僅僅是一種文字的境界，更是一種胸懷，一種人生的境界。古語說：“文章老更成。”袁枚指出：“非精深不能超超獨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領解。”（《隨園詩話》）學術論文的寫作也是同樣的道理，既要展現自己的學問，又要有讀者意識，考慮能讓別人讀懂。胡適說：“古人作詩，有‘老嫗能解’的標準。作文亦宜如此，不可但求我自己瞭解，當力求人人能解。”明白曉暢的文字需要作者花費更艱苦的勞動。如何做到文字平淡呢？周國平先生說了三條意見：

第一，“家無鮮魚，不要宴賓客。”意思是說，沒有新意不要動筆，沒有一己之得不動筆。學術論文，內容為王。內容決定形式。意（科研成果）在言（論文寫作）先。平淡之味，以原味取勝，前提是東西本身要好。沒有研究就不要寫文章。杜牧指出：“苟意不先立，只以文采辭句繞前捧後，是言瘡多而理瘡亂”，“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答莊沖書》）。李漁也說：“意新為上，語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語新、而又字句皆新，是為諸美皆備”（《窺詞管見》）。王夫之更是強調：“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夕堂永日緒論》）

第二，“有了鮮魚，就得講究烹調。千萬不要用不必要的佐料損壞了原味。”林語堂說行文要“來得輕鬆自如，發自天籟，宛如天地間本有此一句話，只是被你說出而已”。寫作要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要有思想深度，有學術水平。不要做作，不要刻意雕琢，不要堆積辭藻，不要故弄玄虛。

第三，“只有一條鮮魚，就不要用它熬一大鍋湯，沖淡了原味。”文字的平淡得力於自然質樸，有味則得力於凝聚和簡練。學術風格以樸實為尚。陸九淵說：“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⑩陳垣推崇清簡樸實的文風，他以顧炎武的《日知錄》為典範，強調學術寫作“只求通達不求文采，要少而精，不要多而美”，他批評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是“借史作文，有許多浮詞”。^⑪

七、結語

雖然大學是一片遠離塵世紛擾的靜心樂土；是沉思默想的處所；是研究發現，知識開發與交流，以及各國智慧發展的避風港；是培養社會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機構，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泥沙俱下、人心不古、世風堪憂，社會很浮躁，現實很功利，一個人的價值往往是由別人來估算的。在這種背景下，大學恐怕也難以獨善其身，而作為知識精英的科研工作者，也難免被洶湧的波濤所裹挾，而難以做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難以沉浸到一個超然物外、超乎喧囂的自由境界。於是，一些學者做學問，也在不斷地向外求，求得別人的關注、理解、尊重、賞識，外求的結果必然是喪失自我，精神分裂。

學術生態的治理與改善是一個系統工程，營造風清氣正的學術環境，須全社會共同努力，運用道德的、法律的、經濟的、行政的多種手段，綜合治理才能取得成效。這既需要有關管理部門出台相應的法律法規來進行外在的“他律”，更需要廣大科研工作者具有良好的學風、學術道德來進行內在的“自律”。

近些年來，有關管理部門已經出台一系列的文件，加強對學術不端、學術失範的治理。例如2016年7月25日下發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學習宣傳和貫徹實施《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

為辦法》的通知,於2016年9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8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科研工作者的道德自律,其中,需要解決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的是學術研究的境界。不斷提高人生的境界,包括做學問的境界、寫作的境界,不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沉淪”,這恐怕是解決學術不端、學術失範問題更為根本的策略。

做學問是一項崇高而神聖的事業。學與德的關係,恒提恒新。只有目的純正、思想專一,才能有所發現、有所創新。廣大科研工作者要以良好的學風砥礪品格、規範言行,誠信科研、誠信為人,以誠實守信、改革創新、積極主動、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開展科研活動。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諸葛亮指出:“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漫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⑩明代呂坤說:“為學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氣。學者萬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做一名真正的、有尊嚴的學者,就絕不能陷入追名逐利的泥淖之中。

“為學之要,先戒名心;為學之方,求端於道。”^⑪如果說高校立身之本在於立德樹人,只有培養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夠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那麼,作為學者的高校教師就應該“學為人師,行為人範”,以求知問道作為做學問的目標,以德立身、以德立學、以德施教,追求學術與人格的統一,做到教書與育人相統一、言傳與身教相統一、潛心問道與關注社會相統一、學術自由與學術規範相統一。

①陳平原在接受《中華讀書報》採訪時指出:“社會科學需要盡可能介入到國家政策的制定中,人文學科却不是這樣。努力獲得領導批示,我不覺得是人文學發展的方向。”

②程郁綴:《有一種美德叫忠誠》,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③宋楚瑜:《如何寫學術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序言。

④戴震:《答鄭丈用牧書》,《戴震文集》,趙玉新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43頁。

⑤⑭參見張勉之:《做學問的境界》,太原:《晉陽學刊》,1981年第3期。

⑥梁實秋:《學問與趣味》,《梁實秋散文精選》,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122頁。

⑦《中國哲學大辭典》(修訂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第720頁。

⑧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165頁。

⑨⑰張世英:《我的思想家園》,北京:中國三峽出版

社,2009年,第3頁;第78~79頁。

⑩楊伯峻:《論語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73頁。

⑪《北大已屆史學系畢業生贈言》,《陳寅恪集·詩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9頁。

⑫《論語新解》,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374頁。

⑬涂可國:《儒學: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辯證統一》,濟南:《東嶽論叢》,2018年第8期。

⑮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298~299頁。

⑯陳來:《境界倫理學的典範及其改善》,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頁。

⑱張清民:《學術研究方法與規範》,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1頁。

⑲孫正聿:《做學問》,北京:《哲學動態》,2009年第8期。

⑳王陽明:《傳習錄》,長沙:嶽麓書社,2004年,第

371 頁。

②《王國維遺書》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年，第 6 頁。

③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第十一章“明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11 頁。

④⑤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學、沈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第 37 頁；第 42~45、57 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61 頁。

⑦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122 頁。

⑧《大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朱子全書》第 6 冊，第 14 頁。請參考朱漢民：《經典詮釋與道統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序說的道統論》，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18 年第 4 期。

⑨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 130 卷，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3116~3117 頁。

⑩北京大學學術道德委員會辦公室組織編寫：《北京大學學生學術道德規範建設讀本》（內部材料），第 97~98 頁。

⑪參見樓宇烈：《中華文化的人文特質》，《人文宗教研究》總第十輯，2017 年第 2 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 年，第 2~3 頁。

⑫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36 頁。

⑬斯塔夫里阿諾斯：《致讀者：為什麼需要一部 21 世紀的全球通史？》，《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 21 世紀》，

吳象嬰、梁赤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⑭王國維著、施議對譯註：《人間詞話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60 頁。

⑮參見《三松堂全集》第一卷《三松堂自序》第十一章，第 312~313 頁。

⑯吳鎮：《新唐書糾謬·原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6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620 頁。轉引自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

⑰王若虛著，胡傳志、李定乾校注：《滄南遺老集校注》卷之三十七，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 年，第 422 頁。

⑱《周國平自選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年。

⑲楊簡：《慈湖遺書》，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6 冊，第 649 頁。轉引自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

⑳蔡尚思：《陳垣先生的學術貢獻》，《勵耘書屋問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82 年，第 23 頁。

㉑諸葛亮：《誠子書》，《諸葛亮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第 27~28 頁。

㉒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85 頁。

作者簡介：劉曙光，《北京大學學報》常務副主任編、編審，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執行秘書長。北京 100871

[責任編輯 劉澤生]